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发展与消亡的农业伦理学诠释

任继周¹ 方锡良²

(1.兰州大学 草地农业科技学院、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730020;

2.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区别全世界概莫能外。但城乡二元结构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伦理观,则为中华民族所独有。中华民族由游牧社会的草地农业发展为耕地农业之时,城廓也相偕发生。贵族和为贵族服务的人群居城廓,从事耕作的农业劳动者居乡野村落。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廓逐步发展为城市,相对于乡村出现日益明显的差别。前者为社会管理、资源占有和分配中枢,后者则拱卫城市安全,生产农耕产品,并为城市提供生存资料,形成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并在城乡两者之间自然衍生与之相适应的伦理系统。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与之相应的伦理观,但城乡二元结构的本质却不曾改变,并使两者的分野日益明显,逐渐固化为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结构雄踞传统农耕社会的文化伦理高地,影响深远。为更好地理解这一独特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影响,我们有必要探索其生成、发展与消亡进程,明晰其历史功过,为创建新时期的农业伦理观提供参照。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 草地农业; 耕地农业; 伦理系统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4-0083-10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Dualistic Structure and Interpretation of Agricultural Ethics in China

REN Ji-zhou¹ FANG Xi-liang²

(1. School of Pastoral and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rassland Agro-ecosystem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2.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ve existed all over the world but the fact that urban-rural dualistic structure and the ethics formed based on it was solely belong to China. Cities appeared in China when grassland agriculture of nomadic society transformed into cropland system, while people who engaged in farming dwelled in villages countrysid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quasi urban are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cities and became distinct from the rural areas. The cities were responsible for social management, became a center of resources possession and distribution, while the rural took on the role of safeguarding cities, producing agricultural goods and supplying resources for city dwellers. Thereby the urban-rural dualistic structure with China characteristics was formed and subsequently an ethical system appeare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couple with the dualistic situation. In thousands of years China went through various historical stages and correspondingly set up ethics which fit to the stages, but the

【收稿日期】2017-06-16

【基金项目】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生态文明战略视域中的“中国农业伦理学”研究(16XZX013)

【作者简介】任继周(1924—),男,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研究,近年来尤其致力于农业系统发展史和农业伦理学等方面的研究;

方锡良(1977—),男,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以及农业伦理学相关研究。

essence of the urban-rural dualistic structure has kept no chang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areas became more obvious and gradually solidified. This structure occupied the top position of cultural ethics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with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is uniqu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historical impacts,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its emerging, developing and disappearing process, to clarify its merits and demerits in the history and to provide a good reference for creating the agricultural eth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urban-rural dualistic structure; agro-grassland system; cropland system; ethics system

一、引言

城乡二元结构之主要特点为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身份与权益的划然分割。乡村居民与其居留的土地凝聚为一体,其农民身份与居留地世代沿袭,不得随意迁徙和变更农民身份。城乡二元结构原为中华族群从游牧农业社会向耕地农业社会转变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社会共生体,为历史的必然,但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演替,今天乡村户籍居民与城市户籍居民所承担的社会义务和所享有的国家权益差别明显,其伦理品格被严重扭曲。农民与市民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别宛如处于两个时代。这不仅妨碍了社会发展,也为现代社会伦理正义所难容。

商代武丁时期(公元前 1250 年),中华北部地区各个族群还处于游牧农业社会,中华族人在周围游牧部族的挤压挟持下,在河南安阳一隅开始耕地农业,并由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逐步转化为农耕定居,由原始氏族社会开始进入奴隶社会。随着定居地区的发展和完善,都邑与乡野始现分异。是为城乡二元结构的最初源头。

从事耕地农业的农耕部落,在沿河阶地或冲积平原之要冲建筑城廓,凭借高墙深池,雄踞一方。为了确保贵族这个权力中枢的宅居安全,奴隶居城廓周围的乡野,从事农业耕作,承担多种劳役,并保卫城廓安全。居于城廓内的贵族管理本部族所属土地资源及居留地的人口,并掌握奴隶及其产品的分配权。随着社会和国家中央集权的发展,原来贵族居住的城廓逐渐发展为城市,成为国家管理中枢,遂与乡野分离,形成城乡二元结构,这一格局由西周而春秋战国,而秦汉,迄于清代,经三千年的演替,逐步固化。

城市与乡村的区别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但城乡二元结构所形成的农民与市民之间社会地位的明显差异却是中国所独有。几千年来古老的中华民族,政体虽屡经变迁,城乡二元结构模式也有所演替,但其基本内涵始终未变,居住乡野的农业劳动者始终处于奴隶阴影笼罩之下。

这一历史传统社会架构和它所衍生的伦理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难容。为此我们有必要探索城乡二元结构及其伦理观的生成、发展与消亡进程,明晰其历史功过,以供创建新时期的农业伦理观参照。

二、城乡二元结构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农业伦理观

在农业社会中,城乡二元结构中城邑贵族和乡野奴隶这两个组分构建了生存共同体,两者互为依存,并自发地发生相应伦理学关联。这类伦理学关联在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其功能也因历史阶段不同而表现其阶段性特征。

(一)原始奴隶社会的萌芽期——商代武丁时期(公元前 1250 年~前 1150 年前后)

这一时期在广大草原地区出现少量耕地农业。为了适应耕地农业的需要,族群生活方式从草地农业的游牧生活转为定居农耕。其时游牧业仍占有绝大比重,属于草地畜牧农业和耕地农业的复合农业系统。在广大草原畜牧部落中杂有少量农耕聚落,城邑与乡野的区分还不甚明显,奴隶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伦理观处于萌芽阶段,但已经显露其特色。

其一,各个农耕族群占有较为稳定的地域,土地和人群的部落归属概念进一步强化。随着土地与附着其上的人口不断增长和凝聚,这种部落归属观念逐渐演化为融合了血缘、地缘和文化等因素的乡土、宗族和国家等群体观念,萌生浓厚的故土意识。

其二,女权社会正在向男权社会转变,伏羲与女娲夫妇可并称为羲娲时代^①即为明证。

其三,有了较稳定的夫妻关系组成的家庭,财产私有概念初步形成。

其四,初现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其社会的道德意识局限于生活资料的占有与分配,部落之间的生存与发展领地的争取被视为全族群成员的义务。

其五,部族的英雄人物在人与自然的抗争以及族群斗争中产生,并逐步成为部族的代表人物。部族伦理关系带有较强的自发性,处于人类文明的原始萌芽阶段。部落领袖作为奴隶主与一般奴隶的各项习惯性关联形成了伦理系统,尚不具备礼仪范式和清晰契约问责性质。

(二)西周礼乐时期(公元前 11 世纪中期——前 771 年)

周人擅长农耕并兼营畜牧业,以周王朝建立为标志,中国的封建制度和相应的伦理系统逐步完善。擅长稼穡的周族在游牧部族强大压力下,不断完善其封建体制,在斗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但终因处于弱势地位,至周幽王(公元前 770 年),西周王朝灭于游牧部落的犬戎。西周立国虽仅 275 年,但它所建立的封建制度和与之相偕发生的伦理系统,却对后世中华文化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王国维曾经在《殷周制度论》中,高度评价周人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与政治文化传统构建过程中的奠基作用,如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宗族庙数之制和近亲禁婚等制度,制礼作乐、范定后世,建立起一个融合政治、文化与伦理、道德为一体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旨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士大夫庶民以成一道之团体^②。”此文从文化与政治演替角度阐述殷周之际的制度变革和周人的政治构建与文化奠基意蕴,却忽视了周人先祖以农事开国立基的基础作用和历史影响。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弥补其不足:“盖周家以农事开国,实祖于后稷,所谓配天社而祭者,皆后世仰其功德,尊之之礼,实万世不废之典也^③。”西周塑造的统治结构、生活模式、文化传统与伦理观念,成为中国社会数千年虽历经战乱纷争而绵延不断、持续发展的稳固根基。而建立在这一耕地农业基础之上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其历史作用尚待进一步分析阐发。

随着西周耕地农业逐步发展,城邑数量和规模逐渐扩大,耕地农业所依存的城乡之间的社会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农业伦理系统雏形渐显。妇女负责采摘与纺织,贵族妇女在参与部分劳作之余,兼行奴隶劳动的管理监督职责。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已蔚然成风。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自发成长幼有序、亲疏有别的家族式伦理观。“家族制度过去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④其轴心是个人在家族血缘网络中的地位。社会的伦理结构就是个人家族地位的扩大和演绎。依据血缘亲疏的自然等次形成社会“礼”的伦理框架。礼需乐来彰显其形态,歌颂其权威,“乐章德,礼报情”^⑤。在农耕文明中“礼乐不可斯须去身”^⑥。礼乐同体,则道统彰显。史称礼乐时代,是为中国社会的农业伦理观奠基期。其若干核心伦理观至今仍不失为中华文明的闪光点。

礼乐伦理系统的高层自认为受命于天,故周王为“天下”共主,可直辖较多的土地和相关属地的奴隶,将“天下”其余土地和附着于土地上的奴隶分封给诸侯,享有宗主权,是为以“君父”、“臣子”相称的

① 任继周:《中国史前时代历史分期及其农业特征》,《中国农史》2011 年第 1 期。

②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王国维文集》第 4 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年,第 43 页。

③ 徐光启:《农政全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10 页。

④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1 页。

⑤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114 页。

⑥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139 页。

君臣关系。此种君臣关系不能越级,如属于诸侯的大夫只与其直属上级有君臣关系,士只与直属大夫有君臣关系,与越级封主无涉。按照血缘关系和对邦国贡献大小,设公、侯、伯、子、男五级。诸侯对受封属地及其子民享世袭所有权。诸侯以下可逐级分封为“大夫”及“士”。大夫和士无权再度分封,只能任命家臣协助属地管理。诸侯之君称公,其下设卿^①,是为“授土授民,分封建制”的封建一词的由来。这一时期西周的农业社会已经具有城乡二元结构的明显特征。

其一,上述伦理座次,统归居城廓的贵族独占。即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②,而孟子则对两者的关系进一步明确,“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③,居城市的君子应“治野人”而被供养,居乡野的“野人”则被管束而供养君子。城乡居民社会地位划然割切。

其二,城廓内的贵族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初期,出于对新事物的关心,亲自参与或派人监督检查奴隶劳作。

其三,土地所生产的农业产品由贵族占有并掌握其分配权。

其四,奴隶所生产的子女,作为农业产品之一,作为贵族财产,可转让给其他部族。

其五,奴隶无限承担贵族所需的各项劳作。

在封建社会的礼乐时期,以“礼乐”为伦理系统主要文化载体,农民生活节律较为迟缓,所承担的赋税义务(大约为十一税赋)较为宽松。这一时期的生活和生产情景被后人理想化,称颂为“诗经时代”。当然这主要是贵族们的感受。最底层的奴隶劳动者,处于后世儒家所说的“劳力者治于人”^④的被动地位,奴隶们的呻吟之声仍不绝于耳^⑤。

(三)东周农业伦理观大转型时期(公元前 770 年至前 221 年)

从周平王元年东迁,到周赧王五十九年为秦所灭,历时 515 年,统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及其伦理系统大转型的关键时期,按其社会伦理观实质可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1.春秋时期(公元前 770 年—前 476 年)

春秋时期,即周平王元年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历时 294 年。周王朝逐步消亡。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生,生产力发展^⑥,尤其工商业的迅速壮大,助长了封建社会内部士族地位的提高,城乡二元结构进入成长期。以士族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精英才思迸发,干政欲望亢奋。他们活跃于诸侯国城邑之间,孕育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主力。有几项标志性事件值得关注。

第一,城邑数量急增,规模扩大。春秋初年有诸侯国 140 多个,每个国家的首府都是或大或小的城邑。后期诸侯国大兼并,主要大国首都更是空前繁盛。例如齐国首都临淄工商业繁荣,居民近万户,是当时的特大城市。工商业者和社会精英奔走其间,为获取利禄的渊薮。

第二,使用金属货币。春秋时期,晋国大量铸造金属货币。侯马晋国遗址还清理出一处规模宏大的造币厂^⑦。

第三,施行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 594 年)实行初税亩,是为中国田税的开始。鲁成公元年(公元前 590 年),作丘甲,按土地面积征收军赋(甲),合税、赋为一。新赋税制度的建立,对国家

① 楚国称令尹或相,秦曾称庶长、不更。卿之官职,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分掌民事、军事、工事、法事。

②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78 页。

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56 页。

④ 见《孟子集注·滕文公章句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载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58 页。

⑤ 《诗经·魏风·硕鼠》篇中的愤懑呼号。

⑥ 冶炼工艺发达,如存世的吴、越青铜剑,冶铸淬炼,合金技术,皆世所罕见。煮盐、冶铁、漆器、铁质工具和农具、齐国的丝织品、楚国的漆器等都有专门工匠。被后世尊为祖师的公输般“鲁班”就生活于此时。

⑦ 可参见孔祥毅所著《晋商学》之导言,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年。

的治理与稳定至关重要,“耕战立国”的基本规模于兹形成。

第四,产生新的地主阶层和与之相应的“士”群体。公有土地所有制废除,土地买卖盛行,经济繁荣,私人讲学之风盛行,社会精英暂露头角,形成百家争鸣的主力群体。

第五,此时草地畜牧业在农业中仍占主要比重,草地畜牧业六畜滋生,牛为主要农业动力,马因战事、礼仪之需,被定为六畜之首^①。养马有功的非子被周王封为附庸^②,是为秦国雏形。

上述诸种社会发展特征,说明封建制本身已经失去生存土壤。以周王为共主的封建体制和附丽于此的伦理系统自然走向“礼崩乐坏”的末路。由此诞生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新的伦理特征。

其一,城市工商业者数量在社会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他们促进了社会繁荣富庶,在生产流通的实践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城乡二元社会的交流融通,其社会权益与价值观逐步取得社会认可。

其二,新生地主阶层对所据有的奴隶统治更为严密,城乡二元结构趋于复杂。

其三,农业中的耕地农业渐居主流,但草地农业仍占较大比重^③。

其四,社会秩序从混乱向稳定过渡,但“天下”仍然列强纷争,远未稳定。

其五,封建伦理系统虽然日趋式微,但封建时期贵族陶铸而成的君子之风仍有明显残留,如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子路结缨而亡、俞伯牙为钟子期碎琴、介子推避封被焚,尤其战场上仍然坚持君子之风的“礼仪之兵”^④、不杀俘虏、不穷追败军等这类为今人视为迂腐的事例并不罕见^⑤。

2. 战国时期(公元前 475 年—前 221 年)

从周元王二年以齐桓公挟周天子以会盟诸侯开始^⑥,到公元前 221 年^⑦秦灭六国结束,历时 254 年,周代礼乐时代至此彻底结束^⑧,各诸侯迳自称国,完成了从封建时代到皇权时代的社会大转型,社会呈现全新面貌。随着耕地农业的逐步发展和土地私有化的完成,巨室望族和它所带动的民间讲学之风大盛,学派蜂起,史称为百家争鸣。其中齐国管仲(公元前 719 年—前 645 年)的“耕战论”脱颖而出,将“耕”与“战”并列。耕以图存,战以强国^⑨。商鞅相秦,将管仲的耕战论进一步发展^⑩,将土地与军旅组

①《周礼·夏官·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畜宜六扰。”郑玄注:“六扰:马、牛、羊、豕、犬、鸡。”参见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873 页。马为六畜之首,反映出早期农业发展过程中草地畜牧业的基础地位,后来随着耕地农业的发展,马更多地应用于战事、交通和礼仪等方面,更多地向国家、军队和贵族等方向发展,而牛在耕作农业的基础作用逐渐突显,文化习俗中对“牛”也更加重视,如立春日,天子扶犁而行、亲耕籍田、迎春祭祀、鼓励农耕,民间亦有糊春牛、打春牛之习俗,牛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得到了农户和官方的重视,而牛所具有的勤劳踏实、任劳任怨、安分守己等性格特征也随着日复一日的耕作活动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农耕文明传统及其伦理道德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城乡二元结构渗透到普通民众的意识深处。

②附庸,低于侯国的小领主。受周王室之封,非子成为秦国的首届领袖。

③至汉代鼎盛时期,耕地面积仅占 4%~6%,春秋时期耕地农业当然更低于此。参见任继周主编《中国农业系统发展史》之序言,2015 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④《淮南子·泛论训》:“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所以为辱也。”参见刘文典撰:《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 年,第 431 页。

⑤春秋时期战争中的道德之举如“鞌之战”、“泓水之战”等故事都出于这一时期。

⑥今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西北。

⑦另说,从韩赵魏三家分晋开始算起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为止,即公元前 403 年至公元前 221 年。

⑧三家分晋是指中国春秋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被视为春秋之终、战国之始的分水岭。

⑨管仲说:“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参见黎翔凤撰:《管子校注(中册)》,中华书局,2004 年,第 924 页。

⑩《史记·商君列传》,“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织密切结合,管理严密,天下效尤,耕地农业大盛。“秦地半天下”、“积粟如丘山”^①,楚国“粟支十年”^②,齐国“粟如丘山”,燕、赵二国也是“粟支数年”^③。甚至韩国的宜阳县,也“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④。大势所趋,诚如管子所概括,“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⑤。农耕与城廓同时兴旺,为城乡二元结构建立了广泛基础。其农业伦理观特色突出。

其一,土地私有化已经通行“天下”。土地和附着于土地的居民由属于天下“共主”的周天子,转化为诸侯及大夫私家所有,土地和奴隶可以买卖。周朝封建伦理观的社会基础遭受致命打击。独立国家概念肇始于此。

其二,独立的“士”知识阶层大显于世。“学以居位曰士”^⑥,附丽于地主阶层的和工商业的士人大开私人讲学之风,出现史称的“百家争鸣”思想解放时代。“士”这一阶层的兴起和发展,某种意义上起到了沟通城乡二元社会、防止社会阶层过分固化和调节社会结构的作用,内在地巩固了传统农业社会城乡二元结构^⑦。

其三,各个诸侯国变革图存,为了壮大各自中央集权政体,法家的严刑峻法、鼓励耕战及其相关伦理观逐渐在百家争鸣中突显,尤其秦晋两大国鄙弃礼仪教化,以法家的“法、术、势”为政策内核,实施军功爵制。为各国效尤成为战国时期政治特征。

其四,春秋时期的伦理古风沦丧。战争规模扩大并日趋残酷。春秋时期难得一见的屠城灭国之事战国时期屡见不鲜^⑧。兵家诡道风行于世,习朴拙、重道德的伦理观不再具社会约束力。

其五,随着城邑规模的扩大和工商业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已居中国历史主流,居处乡野的广大农奴在社会理论系统中进一步被边缘化。

其六,聚集于城邑的统治阶层为了满足其耕战要求,建立了空前严格的户籍制度,将所属土地和附丽其上的居民凝固为一体,实现全民皆兵。商鞅变法主要内涵之一就是父子兄弟成年者必须分居,以户为单位保证兵源、税源。户籍制度使“城乡二元结构”更为稳固,从而为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央集权统治提供了持久有效的伦理支持,为下一阶段的皇权社会奠定了历史基础。

(四)皇权社会的农业伦理观(公元前 221 年—1949 年)

从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六国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时 2170 年。城乡二元结构将众多小农户与中华大帝国熔铸为生存共同体,逐步完成了从封建时代到皇权时代的伦理观蜕变和定型。此后中华农业伦理观不同时期虽各具特点,但从未失去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共同特征。此为中央集权大帝

①《史记·张仪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289 页。

②《史记·苏秦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259 页。

③《史记·苏秦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243、2247 页。

④刘向:《战国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5 页。

⑤赵守正:《管子注译》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2 页。

⑥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2 页。

⑦“士”这个阶层,以其对民生、社会 and 家国的关切,经常能够将民生疾苦和吁求上达统治阶层,又能将统治意志和社会政策等下传给普通民众,起到沟通城乡、君民的作用;同时借助于文化、政治等考核遴选机制为个体发展提供必要的上升渠道,为统治阶层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从而防止社会阶层的过分固化;尤其是在连年征战、社会动荡或政治昏庸、民怨沸腾的时局中,“士”阶层起到传承文化、凝聚精神、表达民意和干政与政的作用,学而优则仕,在个人的穷达之际,“士”或独善其身,或兼济天下。上述特性,使得“士”这个阶层起到了社会调节器与减震阀的作用,内在地巩固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强大弹性机制和自组织功能,使得传统农业社会虽然历经动荡、征战或灾祸,而仍能不断恢复和发展。

⑧如秦赵长平之战,秦坑杀降卒 40 万,赵国丁壮几乎悉数灭绝。

皇权时代的农耕伦理观从秦朝的皇权农耕伦理系统初建期,经过汉代的皇权农耕伦理系统成熟期,迄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尽管历经诸多动乱和政权更替,但其二元结构为社会基础的农耕伦理观的本质从未改变。其中包含几个历史阶段。

1. 秦朝的皇权农耕伦理系统初建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取多项强化中央集权大帝国的创举,如废封建立郡县,书同文、车同轨,建立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系统和纵贯西部的“直道”系统,开凿贯通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的运河等,这些都对中央集权帝国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但秦始皇为统一天下的胜利所陶醉,急于求成,实施了一系列有违伦理原则的谬误措施。

其一,穷兵黩武,建国后10年内连年征伐,几乎每年灭一国,西通西域,南伐百越,未能与民休养生息,平民或辗转死于沟壑,或饿殍相望于途,国力大伤。

其二,大兴巨型工程。战国末期社会苦于长期战乱,资源匮乏,民生极度贫困,而秦代除上述的大举交通、水利建设以外,还穷全国之力,大修阿房宫,建始皇陵墓。其穷奢极欲为历史所仅见。

其三,严刑峻法,施行“族诛”^①、“连坐”^②等亘古未有之酷刑。诚如贾谊所说“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穷困,而主不收恤”^③。

其四,“以吏为师”,“焚书坑儒”,社会伦理系统陷于断裂。集大权于一身的皇权虽可为所欲为于一时,但难以维持久远。源于战国时期绵延数百年的社会思想活跃之风,至秦代为之丕变。士人由神采飞扬的百家争鸣骤然进入“万马齐喑”的阴冷岁月,令人窒息的异样气氛必导致绝地反击。始皇承袭秦国历经39代君王,677年^④苦心经营的霸业,积累不可谓不厚,而不可一世的秦帝国不过15年而土崩瓦解,其历史教训发人深思。

2. 皇权伦理观的成熟稳定期

从汉代(公元前220年)到清朝(公元1912年),历时2132年,此为中华农耕伦理观维持最久的历史阶段。

汉朝汲取了强秦败亡的教训,汉高祖建国之初即宣布“约法三章”:“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⑤,汉初历代帝王施行“黄老”简政措施予民休养生息。期间只有孙叔通从高端整顿朝廷礼仪,建立高层伦理秩序;颁布抑制工商令,从底层安定农业社会秩序。经过五代皇帝、六十五年的修养生息,至汉武帝时国势大盛,他一改先祖传统,对外大举用兵,扩展版图直达中亚。对内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伦理建设,佐以法家的严刑峻法,皇权政体逐渐形成礼法并用的格局,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巩固。

全面考察汉武帝形成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其基本要义有三,即皇权神授、大一统和三纲为特色的伦理系统。

其一,皇权神授说。董仲舒改造儒家学说,杂以阴阳家理论,构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说,一方面确立了皇权不可撼动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以灾异讖言规劝君王统治者自我约束,以保证统治的持久稳定。

其二,巩固大统一的城乡二元结构,抑制工商业,完善户籍政策。皇权政治认为活跃的工商活动,诱导民众脱离农耕之业,世人游离于农耕社会,冲击耕地农业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富商巨贾等豪

① 一人犯罪,全族被诛杀。

② 公元前356年,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③ 贾谊著,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15页。

④ 从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于秦(公元前886年),到秦二世(公元前209年)被废。

⑤ 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362页。

强交接王侯,富可敌国,挑战中央集权^①。董仲舒针对现状提出了“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②的建议,使得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稳定结合,城乡二元结构得到进一步巩固。

其三,支撑大一统的思想建设,执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建设。东周以来,传统封建体制瓦解,百家争鸣,导致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天下莫知所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元光对策的建议“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③,现在他建议诸子百家之“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④,进一步将儒家思想简约化为“三纲五常”^⑤的伦理框架,巩固中央专政。从此儒家独居显学地位,以法家为儒家之辅弼,并行于世,其他各家逐渐失势。

其四,建立了支持大一统的国家教育系统。中央设太学,地方各郡国设立学校,完善教育系统。太学是儒学教育官方化的标志,将“五经”^⑥定为国家教材,确保儒家思想垄断教育。先秦时代中华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夏称校、殷称序、周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⑦。汉代加以完善,“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⑧;按人生不同阶段施以适当教育,“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记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岁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⑨,之后一步步进入庠序、少学、太学,太学中的优秀人才将授以爵位、命以重任,是为“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⑩。这一套空前完善的国家教育制度,将“宗法人伦、尊卑有序、经世济民、修齐治平”等观念意识融入到个人成长以及人伦日用之中,从思想观念深处拱卫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其五,依赖法家强化大一统政治建设。汉代虽以儒教立国,但倚重法家官僚系统掌握政权,重酷刑,以强化中央集权。汉书酷吏传共 14 人,号称独尊儒术的武帝时期就占 10 人。后世称汉代为内法外儒,不为无据。

至此,汉武帝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础,借助儒家的伦理系统,法家的权术手段,构建了完善的中华皇权时代农耕文明的伦理框架,将巨量分散农户与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的政权凝聚为生存共同体,生气勃勃延续几千年,创造了历史奇迹。伦理系统的巨大功能在此充分显现。

(五) 农耕伦理观的异化和消亡期(公元 1949 年迄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随着土地所有制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尤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大潮的冲击下,中华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础的农业伦理观被迫异化并逐步走向消亡之路。

新中国建国之前,利用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环境,在农村发动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胜利。1949 年建国以后,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依然恢复城乡二元结构的传统意涵,农民未获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益。城乡割裂,严重阻滞了社会发展。建国以来支农政策从未改变,多种方式的支农措施从未中断。中共中央在 1982 年至 1986 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2004 年至 2017 年更连续十四年发布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可见农业在中国现代化过

① 如《汉书·食货志》中专门分析了商人兼并农人,迫使农人不得不流亡的状况,详细阐发“重农抑商、轻徭薄赋”的必要性与举措。

② 班固:《汉书》卷 24《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137 页。

③ 班固:《汉书》卷 56《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 年,第 2523 页。

④ 班固:《汉书》卷 56《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 年,第 2523 页。

⑤ 三纲五常,汉代董仲舒综合各家学说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项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

⑥ “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

⑦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55 页。

⑧ 班固:《汉书》卷 24《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121 页。

⑨ 班固:《汉书》卷 24《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122 页。

⑩ 班固:《汉书》卷 24《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123 页。

程中“重中之重”的地位。但成效不显,甚至在国家崛起的大好形式下,“三农”问题依然成为举国为之忧虑的焦点。直到 2001 年,中共十六大以后,才开始采取系列重大措施^①,力图摆脱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恶果,走向新的未来。但城乡二元结构历经封建社会和皇权社会 3000 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以耕地农业为基础的中华农耕文明,根深蒂固,彻底改变非朝夕之功。

三、结 语

城乡差别通见于世界各地。但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则为中国所独有。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社会,伴随耕地农业的发展,形成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结构将统治阶层所居留的城市群体与为统治阶层服务的基层农民群体,截然划分为两个社会。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②儒家思想的扩展。前者居社会领导者地位,对后者有保护的责任;后者处于被保护、被领导地位,接受前者的领导并为前者服务。两者共同保证社会生活正常运行和发展。这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分工样式。

城乡二元结构所体现的社会分工,在一定的社会生态系统里,他们组建生存共同体,并构建了中华农耕文明,雄踞伦理学高地^③,历经两千多年长踞世界文明前沿。直至 18 世纪末叶始败北于海洋文明和工商文明。新中国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城乡二元结构功能异化,以乡村包围城市,取得国家政权,农村养活城市,并支撑中国工业化的最初积累,甚至国际国内战争中从不言败。中国的农耕文明和它伴随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全新面貌达到新的辉煌。应该肯定,城乡二元结构及其衍发的农耕文明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功不可没。

如今在全球一体化的大潮下,我们长期据以自豪的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工商文明迎头相撞,即破绽毕露,拙于应对。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不改革死路一条”^④,我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必然之路。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不断做出挣脱城乡二元结构这个旧窠臼的多种尝试。几十年来我们从未放弃支农的多种努力,多次发表以农业为主的“一号文件”,但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本质认识不足,长时期停留在所谓“离土不离乡”阶段,坚持农民对土地的依附传统,反对农民改变其农民身份。这无异维护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价值观,以致即使在国家崛起的大好形势下,城乡之间的割裂仍然积累为“三农”问题。直到 2001 年的十六大以后,明确提出城市反哺农村,免除农业税,取消了遍布全国的收容离土农民的强制机构。十八大以后更有多个城市开展取消当地的农村户口试点探索,我们迎来了我国新农业伦理观的破晓。

当今时代,倡导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有许多理由。

首先,改革城乡二元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稳定发展。从农村精准扶贫到农民工有效就业,从三支一扶政策^⑤到各类城乡、地区统筹政策,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社会救济制度到留守儿童帮扶计划

① 如取消农业税,明确提出城市反哺农村。

② 出自《孟子·滕文公上》,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58 页。

③ 中华文明深深扎根于农耕传统,赋予农业以基础地位,进而强调耕战立国、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或强调牧民之道,在于谨守农时、丰衣足食(管子),或主张治理之道,在于富庶而教(孔子),如此民众才能安居乐业、安土重迁、顺命安处。悠久的农耕文明传统和丰富的农耕生活经验,一方面塑造了中华文明健进不息、厚德载物和生生不息等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又造就了重视宗法人伦关系、政治伦理秩序和尊卑有序格局等治道传统,深深影响后世文化传统和治理模式,故而占据伦理之高地。

④ 本报评论部:《不改革死路一条》,《人民日报》2014 年 8 月 19 日。

⑤ 三支一扶政策,指国家出台相应政策,鼓励大学生毕业之后,到农村基层地区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这一政策为农村基层地区输送了大批紧缺人才和新鲜血液,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等等,让更多农民分享改革的红利和平等的国民权益,使农民群体具有更强获得感、社会归属感,不仅为社会稳定发展所必需,也是伦理正义所不可或缺。

第二、改革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国家从教育和就业政策、人事任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角度破除固有的社会阶层固化,促使社会各阶层成员正常流动,不断提供社会发展新鲜血液,尤其给广大农村学子和农村基层工作人员以充分机会,发挥个人才能,实现自我,增强社会发展动力。

第三、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施城乡一体化,解放巨大社会生产潜势。以“互联网+”的思维,实现城乡互利共赢,促进不同地区、城乡之间的互联互通、产业耦合^①,可成倍释放生产潜势。

城乡二元结构的消亡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但城乡二元结构的改革涉及社会巨系统的大变革,必将触及社会集团利益和文化深层,绝非朝夕之功。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内涵的提升,新的伦理系统也将伴随新旧事物之间“方生方死”的演进过程而逐步完成。这既要坚定,又要耐心。需要我们沉下心来,以虔敬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坚强的毅力,付出长期努力以期其成。

(上接第 101 页)

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加以政府的引导、公司的合作及社会各界的帮助,通过村落中的农业生产活动、农业景观、自然生态、民俗等文化遗产以及立学兴教等多方面的相互配合,来传承发展耕读文化,既可以激发和增强传统村落中原住民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觉意识,又可以带来人气,增加经济收入,为传统村落发展注入活力,可谓一举多得。但需要注意村落的自身条件和承载能力,不能盲目开发利用而轻视保护,不能千篇一律失去特色,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村落居民的利益和诉求,要保持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王思明、卢勇. 中国的农业遗产研究:进展与变化[J]. 中国农史, 2010, (1).
- [2] 徐 雁. “耕读传家”:一种经典观念的民间传统[J]. 江海学刊, 2003, (2).
- [3] 姚伟钧. 中国古代畜牧渔猎经济论略[J]. 社会科学战线, 2001, (5).
- [4] 刘馨秋、王思明.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困境与出路[J]. 中国农史, 2015, (4).
- [5] 邹德秀. 中国的“耕读文化”[J]. 中国农史, 1996, (4).
- [6] 王玉德, 莫晟. 黄陂大余湾[M].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2.
- [7] 余家菊. 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M]. 台北: 台北慧炬出版社, 1994.
- [8] 周建明.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

^① 任继周:《系统耦合在大农业中的战略意义》,《科学》1999年第6期。